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社会市场逻辑 与治理变革

刘心怡¹

(1.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随着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强调学术独立性和公益性, 但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 高校正逐渐从封闭的象牙塔转向开放的社会中心。本文基于政策分析与文献研究, 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 以及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市场逻辑, 平衡公益性与效率性。研究发现, 市场化改革在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 也带来了功利化、区域失衡等挑战。未来改革应在政府引导下, 构建分类治理体系, 推动高等教育与市场良性互动。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社会市场逻辑; 市场化改革; 要素流动; 治理体系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6

The social market logic and governanc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Liu xinyi¹

¹ Affiliation,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China

Abstract: As China accele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marke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emphasizes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public welfare, but driven by market-oriented reforms, higher education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a closed ivory tower to an open social center. Based on policy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market, and how higher education adapts to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market and balances public welfare and efficiency.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promot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market-oriented reform also brings challenges such as utilitarianization and regional imbalance. Future reform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classified governance system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market.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market logic; market-oriented reform; factor flow; Governance system

作者简介: 刘心怡(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通讯作者: 刘心怡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推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和发展方向。传统的高等教育理论认为高校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以学术自由为核心价值,然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已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协同,甚至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市场力量牵引高校发展的趋势。当前高等教育正经历从传统学术共同体向市场服务者的角色转变,这一过程呈现出要素配置市场化、服务功能社会化以及治理结构多元化等三个显著特征。通过对多所高校的案例可以发现,市场化改革使高校科研转化率得到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基础研究投入下降与人文社科专业萎缩等结构性问题。本文提出有限市场化改革框架,建议通过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完善要素流通机制与强化政府调控职能等路径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社会市场要素及其改革逻辑

社会市场要素主要包括沉淀在产业与农村集体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数字等资源,其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是经济市场追求的主要目标。当前市场制度改革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与制度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强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与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这些宏观维度的改革举措必然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科研方向产生深远影响,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和技术的核心供给者,必须积极回应并融入这些市场要素改革的需求。

(一) 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与要素市场打造

现代流通网络建设与市场信息交互渠道的完善是打破信息孤岛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流通体系建设亟需构建立体化物流网络,在国家、区域与终端层面补齐流通短板。同时,各部门与各地区的数据标准不统一严重制约了市场运行效率,因此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关键数据以实现市场主体信息的一网通查,并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确保各类市场信息能够实时互通。此外,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推进要素市场的深度整合与制度创新,这一进程需要从土地、资本、技术数据、能源和生态环境等关键要素市场协同发力。

在土地与资本要素市场,通过同权同价机制促进要素平等交换,消除区域性准入壁垒以破解市场分割问题;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则聚焦制度突破,加快数据产权立法以明确权属规则,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开放与社会数据合规流通。这些举措为高等教育产学研对接与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高效的基础设施支撑与制度环境。

(二) 推进商品与服务市场统一及监管规范化

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以及市场监管与竞争秩序规范,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在商品质量管理体系建设中,我国正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机制并推广溯源技术,构建预防监控处置闭环管理体系。标准计量体系建设聚焦新兴领域,加快数字经济等领域标准研制以提升国际话语权,这直接倒逼高等教育调整专业结构以培养符合高标准新型人才。同时,我国正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规则框架,制定通用市场监管权责清单,针对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并在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治理方面细化认定标准。改革的落地依托跨领域协同机制与制度保障,通过实施市场准入壁垒清理专项行动与加快相关领域立法,逐步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校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三、社会市场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重构

在资源依赖与系统演化的双重逻辑下,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随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经历了深刻的变迁。

(一) 传统高等教育理论中的相对独立机制

在传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中,高等教育在适应并引领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学术自由的保障机制与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两个层面,即高校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应不受市场短期行为的干扰以追求知识的深度与原创性,同时强调通识教育与综合素质发展以防止教育被工具化和短视化导向所左右。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高等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供给方,更是文化传承与批判性思维培育的重要空间,其作为超越功利的学术机构,核心价值在于面向未来。然而,随着市场逻辑日益渗透社会各个层面,传统高教理念所倚赖的学术共同体自治正面临空前挑战。

(二) 新时代背景下关系的动态演变与协同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并行推进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重塑，其功能的社会化、角色的复合化与目标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社会市场的迅速变革正在倒逼高校调整专业结构与课程体系，以应对复合型与高适应性人才的迫切需求，例如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在高校中的爆发式增长折射出教育结构对市场信号的高度响应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反向需求愈加显性，促使高校不断拓展其边界，设立校企联合研究平台与技术转移中心，形成知识技术产业协同融合的新模式。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强调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为高校办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制度空间，促使高等教育从接受式适应者转变为共建式参与者，成为制度创新与社会结构重塑的主动参与者与引领者。

四、 社会市场改革对高等教育的深度影响

随着社会市场逻辑在经济运行中的全面嵌入，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结构均面临深刻重塑。改革不仅改变了高校的资源供给模式，也对其组织结构、学科生态与治理逻辑提出系统性的重构要求。

（一） 资本要素变革下的办学逻辑重组

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体现是推动了高校财务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资本来源渠道的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国内顶尖学府为例，其社会筹资占学校总收入的比例在近七年内实现了大幅跃升，显示出高校已逐步摆脱对财政拨款的单一依赖，进入政府引导与社会投入双轨并行的新阶段。这种财务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不可避免地促使高校在资源配置与战略方向上更加注重投资回报与市场反馈。近年来，企业主导的科研课题数量快速增长，部分校企联合实验室采用企业出题与高校解题的协同模式，极其有效地提升了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契合度。然而，资本逻辑的强势介入也引发了学界对于学术自主性被资本蚕食的担忧。若科研目标完全交由市场终端驱动，其带来的短期逐利导向极有可能导致基础研究空间的急剧压缩，从而在根源上损害高等教育作为前沿知识创新基地的长远战略功能。

（二） 劳动力市场演化对学科生态的冲击

社会市场机制对劳动力的动态需求直接且猛烈地作用于高校专业设置。在2020至2023年间，全国高校共新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近三百个，同时大批撤销了部分产出率不高的人文社科类专业，这充分体现出教育系统对宏观市场导向的快速响

应能力。在短期内，这种调整极大优化了学科供给与社会就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匹配，有效缓解了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紧迫问题。但从长远的人才储备战略来看，这种功利化的结构性调整也带来了学科生态严重失衡的潜在风险。基础学科与人文社科专业因其短期经济转化率不高而频繁成为被优化的对象，这不仅破坏了大学知识体系的多样性，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削弱国家未来的基础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积淀。

与此同时，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在打破地域壁垒、促进人才自由流动的同时，却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地区间高教资源分布的极端不平衡。以西部高等教育重镇陕西为例，近几年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流失了大量正高级科研人员，且绝大多数直接流向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高校。这种由市场薪酬和资源级差带来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高校在高端人才的存量博弈中持续处于劣势，进而危及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三） 技术要素市场化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专利转化率的提高是衡量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效率的关键指标。部分理工科强校在近三年内累计转化专利数以百计，产值突破数十亿元，客观反映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显著增强。但剥离总量的表象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转化项目高度集中在光电、芯片等热门应用领域，而其他传统学科的成果转化率依然极低，呈现出严重的技术转化结构失衡现象。此外，伴随技术要素市场化而来的还有知识产权纠纷数量的激增，许多高校法务部门处理的侵权案件连年翻番，显示出有制度保障与法律支撑严重滞后于改革步伐，凸显出高教系统在转型期普遍存在的法治盲区。

（四） 高校组织形态的重塑与文化冲突

随着效率至上的市场化逻辑深入校园治理体系，各类面向市场的新型组织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科技成果转化公司、产业研究院等。由于这些机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核心运作逻辑，与传统院系以学术真理为导向的体制存在天然的隔阂，导致组织文化间的张力与摩擦日益凸显。在面临双轨制考核时，部分教师开始出现行政目标优先于学术追求的倾向，这不仅破坏了纯粹的教研氛围，也对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核心定位构成了严峻挑战。

五、 市场化改革的现实困境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冲

突

尽管市场化改革在盘活高校资源、提升办学效率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其在狂飙突进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既是价值理念的剧烈碰撞，也是制度供给匮乏的必然结果。

（一）效率导向与教育公益性的剧烈张力

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其根本属性在于学术传承与社会育人，但市场逻辑天然强调投入产出比与效益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教育价值的功利化异化。以上海部分顶尖高校为例，其部分热门应用型硕士项目的学费在短期内呈现跳跃式上涨，直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教育资源公平性的强烈质疑。生源数据表明，高昂的学费门槛使得此类项目中来自高收入金融行业的学生比例占据绝对主导，而具有公共服务行业背景的学生则被大幅挤出。这一现象的本质，是高投入与高回报的资本逻辑对学科发展和教育准入的深度渗透。当越来越多的高校受利益驱使，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倾斜至盈利性强的专业时，那些慢产出、高风险的基础学科则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风险。

（二）区域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与阶层固化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初衷是促进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高效配置，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本与人才的自由流动却残酷地加剧了资源积聚的两极化趋势。西北地区的一流高校在激烈的市场抢断中，短短数年间流失了数十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在横向科研课题经费的吸附能力上，这些西部强校甚至不及同等体量东部高校的十分之一。这种由于市场机制造成的持续性贫血，直接导致西部高校在重点实验室的设备更新、科研平台的搭建上举步维艰，进而对其核心科研竞争力构成实质性绞杀。部分西部高校的青年教师甚至将本地执教视为积累职称的跳板，一旦评上高级职称便立刻兑现市场价值流向东部，彻底形成了一条培养、流失、再培养的恶性循环链条。此类制度套利现象严重削弱了国家宏观区域均衡政策的实际效力，暴露出当前粗放的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根本缺乏自我纠偏与区域平衡调节的能力。

（三）制度供给滞后与治理能力的瓶颈

改革的快速推进在高校内部催生了对制度配套的巨大需求，但现实中制度供给的严重滞后已成为阻碍改革深化的核心掣肘。这主要体现在三

个维度的突出短板。首先是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的极度匮乏，绝大多数地方高校尚未建立专职且具有市场敏锐度的技术转移团队，导致海量专利沉睡在实验室，转化周期远远落后于市场迭代速度。其次是绩效评价体系的顽固僵化，即便外部市场导向日益强烈，但高校内部的人事考核依然刻板沿用唯论文与唯项目的指标体系，导致许多从事高质量应用转化研究的教师在职称晋升上面临制度性歧视。最后是产权与风险防范机制的模糊不清，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科技成果入股的过程中，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导致的法律纠纷频发，不仅极大地打击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也让高校本身背负了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与声誉危机。

综上所述，这些问题并非偶发的孤立事件，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市场化转型中路径依赖与制度惯性的集中爆发。长久以来，改革往往遵循先实践后制度的经验主义渐进路线，导致制度规范永远滞后于实践创新。要彻底打破这一僵局，就必须在拥抱社会市场的同时，同步启动内部制度系统的底层再造。

六、国际经验比较与本土化创新

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发达国家早已在不同制度历史路径下进行了广泛且深刻的探索。系统梳理并审视其经验与利弊，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治理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

（一）高度市场化下的效率与公平博弈

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稳居全球前列，其强大的社会筹资能力与庞大的捐赠基金规模不仅构筑了坚实的财务基础以支撑学术自由，更使大学具备了极其强烈的自主改革与抗风险能力。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核心维度上，美国高校普遍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许可办公室，通过确立明确的收益激励机制与产权归属法案，极大激发了教师群体与科研机构的创新积极性。然而，这种高度依赖资本逻辑的市场化体系也暴露出了致命的社会问题，其高等教育体系呈现出触目惊心的高度分化与阶层固化倾向。高昂的准入门槛使得顶尖大学中来自极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深刻反映出纯粹的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严重的公平缺失。尽管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各类助学金手段进行宏观再分配，但在资本的虹吸效应面前，这些举措始终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其结构性的不平等格局。

（二）产教协同与法人化治理的转型尝试

德国与日本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制度样本。德国高等教育极度强调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与跨国企业共建联合研究院并实行双负责人制，确保了校企双方在决策与目标设置上的绝对对等参与。该模式凭借稳定的经费保障与高度贴近工业需求的实践导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过度依附于企业盈利目标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部分探索性的基础研究项目面临被全面边缘化的严峻风险。此外，在快速变化的数字经济时代，其过早锁定的职业路径反而限制了学生跨领域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日本为应对沉重的财政压力与低下的行政效率，全面启动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通过在高校内部设立产学研协同推进机构，整合技术转移与创业孵化资源，显著提升了高校的市场适应能力与科技转化效率。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样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学术异化问题，过度注重短期量化成果的考核机制导致教授群体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行政审批与项目报告上，不仅部分基础研究质量出现断崖式下滑，学术自由也遭受了潜在的制度性侵蚀。

（三）构建中国特色敏捷协同的治理体系

立足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国情，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必须彻底摒弃单纯放权或强硬管制的二元对立思维，转而探索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开放与稳定的敏捷协同治理模式。在宏观理念层面，必须坚持放而不脱与收而有度的辩证统一，高校在资源使用与组织架构上应获得充分的自主权以提升市场适应力，而政府则必须利用制度底线牢牢守住教育公平与基础学科发展的大门。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应当全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体系，明确划定市场化改革的绝对禁区，绝不允许特定基础学科因短期的市场失灵而被迫退出。同时，改革的推进必须实行分类指导与差异发展策略，针对研究型、应用型及职业类院校实施量身定制的市场化路径，并构建基于周期性科学评估的动态反馈机制，以此实现改革政策的闭环管理与精准修正。

七、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

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战略蓝图中的核心板块，其推进过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与战略定力。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逻辑与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本文提出以

下系统性改革路径。

（一）厘清政校职能边界与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当前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在资源配置与自主办学权方面依然深受传统行政管理的深度制约，政府在微观干预与宏观放权之间的摇摆不定，严重压抑了高校内生动力的激发。破局的关键在于全面完善高校办学自主权清单制度，以清晰的法律条文明确学校和专业设置、人才引进与财务管理等核心领域的自主权限，切实提升治理的透明度与政策的可预期性。政府管理方式必须由繁琐的审批制向高效的备案制全面过渡，完成从高高在上的控制者向服务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转换。在资源配置维度，应当彻底打破长期以来按行政级别与学生规模分配财政资金的路径依赖，全面推行竞争性拨款与基础拨款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不同类型高校设定差异化的绩效引导指标，同时设立专项兜底资金以保障薄弱学科和中西部地区高校的生存底线，通过建立涵盖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估体系，强力倒逼高校完成内部治理转型。

（二）贯通科技供给链条与筑牢教育公平底线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诉求之一在于彻底激活高校的科技创新潜能与社会服务能力。面对当前科研到成果再到转化链条中的重重制度堵点，必须大刀阔斧地修订高校科技成果使用权制度。通过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允许并在法律层面保障科研人员在技术转化中持有股份与享受分红，真正实现人尽其才与技尽其用。此外，政府应积极引导建设校地协同创新平台，鼓励高校与地方产业集群共建产教融合基地，打造校企政三方紧密联动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然而，市场机制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公平保障，极易导致资源向上层板结与机会向底层封闭，这与国家共同富裕的战略宏图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建立系统性的教育数字鸿沟补偿机制，利用国家级智慧教育平台向中西部高校无偿开放顶尖教学资源。更重要的是，要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深度嵌入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环节，为边缘落后地区高校设立长期的专项发展基金，并以制度化的形式鼓励双一流高校通过对口支援输出优质教育资源。最后，由多部委联合设立国家级改革评估中心，围绕资源配置效率与教育公平指数开展全周期的大数据动态监测，为政策的精细化微调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八、 结语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全面转型的历史性关键节点,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与全局性战略地位愈发凸显。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和前沿科技创新的最重要载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宏观语境下,其改革方向既不能毫无底线地完全倒向市场化,也绝不能因循守旧地拘泥于传统计划体制。唯有在无形的无形之手与有形的有形之手的动态战略互动中,方能蹚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崭新路径。

本文系统剖析了社会市场变革中高等教育转型的底层逻辑与现实困境,指出在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推动高等教育从粗放的规模扩张大步迈向内涵式的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战略方向继续深化:一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及其对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深层影响机制;二是基于区域禀赋差异的不同类型高校特色化改革路径探索;三是高度市场化语境下教育公平的法治化保障机制构建。

必须深刻认识到,市场化永远只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工具与手段,立德树人才是高等教育不可动摇的根本使命。在浩浩荡荡的改革浪潮中,唯有始终坚守这一正确的价值导向,避免陷入为改革而改革的盲目误区,才能确保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真正兑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承诺。

参考文献:

- [1] 张浩正,张瑞瑞.类市场化治理:高等教育改革的运作逻辑及价值定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04):138-143.
- [2] 蔡永平,朱立峰.国外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特征及启示[J].文教资料,2019,(26):139-141.
- [3] 睦依凡,王改改.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21,(10):8-13.
- [4] 张敏.高效可持续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建设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46-47.
- [5] 郑润廷,徐艳茹,刘继安.理解高等教育市场化态度与实践的差异——基于思想实验达成的反思平衡[J].江苏高教,2025,(02):13-21.
- [6] 谭小芳,冯珂珂.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产品属性与市场化分析[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2,10(04):30-40.
- [7] 林少婷.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弊端及其对策[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8(01):12-16.
- [8] 郝广龙.当代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与回归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22:9-10.
- [9] 颜苗苗,周桂芹.高校数字化转型的智慧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出场语境、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24(01):125-135.
- [10] 杜学元,周敖冬.教育数字化转型下高校数字教育的价值旨归、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J/OL].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2026-03-22].<https://doi.org/10.16246/j.cnki.51-1674/c.20251121.001>.